

謎

中

謎

刺汪案的始末(四)

孫鳳鳴刺汪精衛的真相

硬敲杜老闆大竹槓

刺汪元兇王亞樵時常硬敲杜月笙的大竹槓，本來黃金榮和杜月笙都是在上海黑社會中，以幫派起家的，杜月笙在北伐期間，先是響應北伐軍進入上海，後又對打擊和清除共產黨工作，與北伐軍北路軍總指揮部政治部主任陳羣，在清黨業務上，對陳協助很大，接着在淞滬地區的治安上，對淞滬警備司令楊虎的協助也很多。所以北伐以後，在陳羣和楊虎的大力協助下，杜月笙在上海社會中，「杜老闆」三個字，真是人人禮敬，噹噹響的了。杜月笙的混法和他的理財弄錢，是合而為一，並行不悖的；所以杜月笙在上海，人混起來了，經濟上也有了深厚的基礎。而且他的徒兒法孫、羣衆嘍囉，大多是在十里洋場上，吃、喝、玩、樂、賭那些類同吸血弄錢的場合中混的。王亞樵的羣衆，大多是一些工人階級、地痞、流氓的亡命之徒，而王本人又是幾乎揮金如土，手頭大方得要命，當然便經常弄得手頭不濟，拮据困窘，因而對杜月笙那種財源滾滾的作法，不免心頭有些不大服氣。所以王亞樵對杜月笙，

不但經常擺出分庭抗禮的姿態，而且還大大小小的有些挑釁行爲。但是杜月笙對他總是退讓三分，常常以破財消災的作法，花幾個錢算了。杜月笙和王亞樵之間的橋樑，便是陳羣。陳羣在杜王之間，確是幫着杜月笙解決了不少問題。加上北伐、清黨時期的許多協助合作，杜月笙對陳羣可說彼此很够意思的。所以陳羣創辦「正始中學」的經費，可說是「杜老闆」一手包辦的。

有一次，大概王亞樵的手頭上又有些拮据了，先是派人把華格臬路杜月笙的公館炸了一個大洞，繼之又在杜月笙經營的「逸園」跑狗場內，擺了一個自製的土製大炸彈，上面貼上一個大紅紙條子，明白的寫上「王亞樵敬贈」幾個大字。幾乎日進斗金的跑狗場，立時人人迴避，無人膽敢問津了。

杜月笙面對這個問題，當然着慌了，趕快去找陳羣解決問題。陳羣事先早已得到了訊息，他說：

「杜老闆，這個問題的解決，我恐怕分量選不够，我建議你到勞神父路去看許靜老（總統府資政許世英之稱號），他是王亞樵的同鄉前輩，

許志遠口述。賀恆仁撰稿

他出來講話，王亞樵一定是「閒話一句」的。」

這時正是民國廿年，長江大水爲災，許世英任賑災委員會委員長，正爲了賑災問題跑到上海，居住法租界，拜託杜月笙大力支持成立了一個「上海華洋義賑會」，把上海市一些知名人士，統統拉入了這個組織，分頭設法從事勸募工作。選把梅蘭芳從北京請來，配上金少山和趙培鑫等名票，以義演得來的錢充作賑災經費。杜月笙在這個時候，要找許世英出面來幫他解決問題，當然是不會有困難的。杜月笙於是馬不停蹄的跑到勞神父路去看許世英，許世英滿口答應，盡力而爲。而且立時整衣冠帶，命駕出發去找王亞樵。

王亞樵一看許世英出面了，這位鄉長大老的面子，是不能不賣的；但是對杜月笙的鈔票也是要敲的。他很漂亮的向許世英說：「靜老，你老人家出面，我還有什麼話好說的。不過『杜老闆』錢賺的太多了。你老人家是鄉前輩，今天又是賑災委員會的委員長。長江大水爲災，安徽長江兩岸災民，嗷嗷待哺。請『杜老闆』大發慈悲，拿出大洋二十萬元，救濟安徽災民，你老人家以

爲如何？」

許世英久歷世故，他稍微考慮後便說：「好，那我將你的意思，和『杜老闆』研究一下，你等我的回話好了。」

杜月笙在接到許世英轉達王亞樵的意思後，毫不考慮的滿口答應，立刻拿出現大洋二十萬元，交給「華洋義賑會」轉滙安徽，充爲賑濟安徽水災之用。這個二十萬現大洋，可不是個小數字啊！比今天的臺幣兩億元的價值還頂用呢！

北站行刺財神驚魂

民國廿一年，十九路軍調駐上海，該軍連年轉戰於湖南、山東、河南各地，急待整補。王亞樵與陳銘樞於北伐期間，即在京滬等地，因響應北伐進軍及清共工作，與陳銘樞多所接觸。

此次乃自動應允爲該軍成立一個補充團，由其推薦余立奎任團長，謝文達任副團長，許志遠任營長，數月之內，即行成軍。該部後於「一二八」上海之戰中，以剛剛編成的補充第一團，駐防瀏河、崑山太倉一帶，日本由國內增援部隊，以軍艦掩護，向我後方進襲，補充團步槍仍不齊全，即奮起與我第五軍並肩作戰，堅守防線，給日軍以重創。

民國廿年夏天，王亞樵受汪精衛改組派的策動，稱宋子文爲粵奸，並稱要反對蔣委員長，先要把宋子文除掉。王亞樵派他的以爆破見長的行動大將謝文達（謝爲浙江寧波人，黃埔一期，後任汪僞第十師師長，駐防京滬路，屬任援道第一方面軍，戰後由香港逃往日本，現已去世）負

責指揮。謝文達把行動人員分成兩個部門，一部爲掩護，一部爲行動，掩護人員負責施放烟幕彈，待行動開始，任務達成時，即施放烟幕，使行動人員可以安全撤退。孰料烟幕彈投擲早了一步，是時宋子文攜同秘書唐海安之弟（唐海安當時任財政部江海關監督，爲當時財政部下一大肥缺），一下京滬車，走出上海北站。二人並肩而行，同樣穿白西裝，戴同色同型的巴拿馬帽子，烟幕彈一擲出，行動人員已分不出那一個是宋子文了，匆促發槍，把唐海安胞弟（係財部秘書）打死了，行動規模之大，設計的周全，在上海北站還是第一次。在烟霧瀰漫中，行動人員當然是安全撤退了。在人我不分中，槍聲連聲射出，宋子文雖然沒死，但是驚嚇的情況，也僅差一死，所以宋子文對王亞樵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計的向蔣委員長進言，對戴雨農的軍統局經費，有求必應，大力資助，爲的就是要戴雨農把王亞樵早日幹掉，以解除他的威脅，而洩胸中積恨。

朱執信廖仲愷之死

王亞樵爲「刺汪」的元兇，固已爲其所承認，但是「刺汪」祇是第二目標，刺殺蔣委員長才是第一目標。王亞樵也不是一個沒有思想，沒有頭腦的人，又怎麼會甘爲人收買利用呢？這真是「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」，說來話長，此中因素，錯綜複雜，層層相因，和中國的當代許多大事，都可以說是相互牽連，息息相關，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行刺案件。

國民黨在總理孫中山先生生前的團結，得力

於朱執信很大。朱執信對於名、位、權、勢觀念淡薄，而且勇於化解朋友同仁間的不同意見，再大的衝突，經過他的穿插調解，都可以化干戈爲玉帛。他和胡漢民、汪兆銘是日本法政學校的同學。如果有朱執信在，蘇俄顧問鮑羅廷，不會左右逢源的拉著汪兆銘，打擊胡漢民。再運用廖仲愷有限度的主張「容共」，和堅決反對「容共」的胡漢民針鋒相對，冰炭不容。然後再運用廖仲愷的被刺殺，拉著汪兆銘，嫁禍於胡漢民，逼著胡漢民出國，使國民黨失去了一位堅持立場原則的大將。當時在廣州有一股暗流據說：「廖案的執行人，是鮑羅廷運用下的共產特務。因爲只有這樣才能促使國民黨的分裂，才能遂其分化離間大計。」蔣委員長在民國廿年九月廿一日，接到兩廣和閩、馮拉攏張學良在北平組織國民政府，擁護閻錫山爲國民政府主席，汪精衛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，思及國民黨同志分裂情況，「聞聲鼓而思將帥」，想到朱執信，不禁潸然淚下，當然是有很深的道理的。

孫中山先生在聽到朱執信被桂軍在虎門要塞以亂槍射殺以後說：

「執信同志的遇難，對本黨的影響太大了！真不啻失去十萬大軍。」

孫中山先生的意思，便是朱執信在團結方面所發生的力量。

甘草遽逝調和乏人

第二位「甘草」人物便是譚延闓。譚延闓爲清末翰林、諮議局議長。民國成立後，譚延闓任湖南

都督，胡漢民任廣東都督，李烈鈞任江西都督，柏文蔚任安徽都督，為國民黨中最具實力人士，亦為反袁護法二次革命中的有力人士。孫中山先生生時，對譚延闓甚為禮重。譚延闓為人寬宏大量，對權位名利，一向退讓三分。且見地遠大，善於說詞，善於和事穿插，遇有同仁爭執，經其雙方化解，必可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蔣委員長受命任國府主席，請其出任行政院院長。當時胡漢民任國民政府委員兼立法院長，柏文蔚因陳調元主皖，已與蔣主席芥蒂頗深，影響所及，李烈鈞內心亦甚為不快。中原大戰前，多次力邀出任討逆軍參謀長，未蒙首肯。蔣主席在京出發督戰的當天一大早，親趨私邸，李烈鈞仍早眠未起，坐候時餘，李烈鈞起床洗漱後，僅請其同往前方虛應一下場面，希求發生一些影響作用，亦未蒙見允。胡漢民為人，耿介自持，有德有才，惜容人及與人為善的雅量欠佳，在主持立法院期間，國府大員，週末不去滬度假，「一品香」無發現其踪跡者，可說少乎其少。唯獨胡漢民，儘管其嫡系幹部陳羣、楊虎，與持志大學董事長兼校長何世楨等函電約催，總不見其大駕光臨。此一期間，黨內大事溝通，多為譚延闓出面，大小問題，均多得彌補裂痕，順利過關，蔣主席對譚延闓依賴甚多。

「中原大戰」前，張學良有舉足輕重之勢，閻錫山、馮玉祥對之極盡拉攏之能事。幸張深明大義，通電擁護國民政府，並派軍入關，逼退閻錫山，也嚇跑了汪兆銘。惟張學良於通電時提出：「召開國民大會」及「大赦政治犯」兩問題。本來

，「召開國民大會」為國父夙所主張，且與段祺瑞會談時亦曾提出，臨終猶諄諄告示同志，見之遺囑；而「大赦政治犯」為國民大會召開前後甚為易行的措施。此時蔣主席身在前線，即批交行政院，發表聲明，接受要求。適此時譚延闓因病逝世，蔣主席事先未經與黨內要員溝通，事後又無人穿插，電報到達行政院令飭發表聲明，接受「召開國民大會」要求。此時國民政府行政院事務，正統由胡漢民以國民政府委員身份，全權處理，他看到電報，大不以為然說：「建國大綱，明文訂定由軍政而訓政，訓政完成，始可實行憲政。今軍事上『中原大戰』仍在進行，掃除軍閥勢力的軍政工作，仍未完成，竟而越級『召開國民大會』，實行憲政。寧有此理。」遂令不予理會。蔣主席在前線接到如此報告，幾為之大吃一驚。他肝衡全局，馮玉祥和閻錫山雖大勢已敗，但撤退中是否會捲土重來，亦難肯定。如不適時發出接受張學良要求之聲明，即為對奉張食言。奉張如以此故而轉向與馮、閻合流，勢將功敗垂成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於是乃當機立斷，在戰地發出接受「召開國民會議」聲明。胡漢民在京聞及此電，據說在國府辦公室裏勃然大怒，拍桌大罵，因而與蔣主席間造成嚴重的裂痕。

「中原大戰」結束，蔣主席由前線返來。行政院長譚延闓逝世，由蔣主席暫兼行政院長，教育部長蔣夢麟辭職，返回北大教書，蔣主席又再兼教育部部長，胡漢民更為之不滿，於隨處謾罵批評中有「政不成政，教不成教」之語。蔣主席聞及，乃於晤見時說：「我有什麼錯處，你儘可當

面說，何必到處謾罵批評呢？」胡即大怒說：「現在總理死了，我不來教訓你，誰來教訓你？」著實使蔣主席無法忍受，遂釀成嚴重衝突。事發之當日，胡即在其住宅三元巷中，失去自由（革命軍總部亦在三元巷）。次日，即由監察院提出舉發，由中央常會決議，准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。當夜粵中在國府要員，如鐵道部長孫科，及王寵惠、古應芬等均乘京滬夜車去滬，旋即由汪兆銘、唐紹儀、鄒魯等集會廣州，成立「軍政府」及「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」，公開與南京國民政府對立。

「中原大戰」閻馮失敗，奉張內附，廣西李宗仁、白崇禧正謀如何遵令接受各種指示，中央國民政府的統治威信，可謂已達北伐後之最高點。如當時譚延闓逝世再遲幾日，能佐助蔣主席，適時溝通各方意見，不致產生粵寧之對立局面，則「大有為」的局面，將導致中國於富強。今竟不幸如此，致「大有為」變成了大難為，以致李宗仁、白崇禧再變，共黨猖獗，日寇毫無忌憚侵我東北，造成「九一八」事變，兵連禍結，國事又再步入艱難難境。設如朱執信仍在，譚延闓不死，此二位「甘草」作用的發揮，必可使黨裏益形團結，共同相忍為國，撫今思昔，殊令人感慨萬千。

民國廿年七月廿三日，粵變發生後，蔣主席鑒於內憂外患之嚴重，攘外必先安內，團結乃能禦侮，乃書告全國同胞，願國人「明其是非，別其利害，主張正義，挽救危亡」。在文告中明白指出：

「故不先消滅赤匪，恢復民族之元氣，則不能禦侮；不先削平粵逆，完成國家之統一，則不能攘外。」

民國廿三年廬山軍官訓練團中，蔣委員長更舉出明朝亡國的殷鑑，指出今日國家民族存亡，已間不容髮，惟先「安內」，始有力「攘外」，欲求「攘外」，必先「安內」。這一號召，像一股巨大的氣流，震撼了國人的心弦，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國人起死回生的燈塔，走入迷途的青年，紛紛由共黨陣營，脫黨自首，割據擁兵的軍閥也紛紛歸向「安內攘外」的政府陣營。如西北軍的閻錫山、馮玉祥，東北軍的張學良，粵變、閩變的順利解決，豫鄂的邊境大別山蘇區、江西瑞金中央蘇區，在多次圍剿中，共軍乃不得不作逃離蘇區，開始作二萬五千里逃竄的突圍。這都是無形力量，直使素以政治號召為法寶而心懷異軌的共產黨，他們一方面要設計一套瞞天過海的說詞，來光明正大的和「安內攘外」對抗，另一方面便是以遊說團進行分化離間，削弱「安內攘外」的力量，閩變和雙十二事變，便都是明顯的例子。同時更展開對「安內攘外」的領導人，以及對「安內攘外」政策的有力執行人，以各種關係，配合運用，進行狙擊暗殺工作，「刺汪」和刺殺楊永泰就是在這種行動下促成的。這也都是民國廿四年八月一日，毛澤東在毛兒格所發出的「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」提出的所謂「抗日民族統一陣線」的基本原因，就是在「安內攘外」這個震撼中，這個威力所向披靡的重壓下，絞腦汁、

集智慧，長期的思考研究，所打出的一張王牌。

「安內攘外」的政策是正確的，確是獨照時弊，挽救國家危機的良方妙藥。然而在黨的內部，僅僅是軍中的教育工作，做的很好，也確收到了非常大的效果。可是對一些高級領導人員的意見溝通，做的實在不够，當然在疏通聯繫、互助合作、加強團結上面，那就更成問題了。如胡漢民和蔣委員長，因開「國民大會」而意見相左，衝突，始終即無迴轉餘地，連「九一八」、「一二八」外侮強敵壓境，「共赴國難」的號召，亦無動於衷，甚且越離越遠。汪兆銘和胡漢民本為同鄉同學，交稱莫逆，竟至互相疑猜，各行其是，終成水火。陳銘樞本來在安內上，是很有貢獻的。民國廿年蔣主席為求團結禦侮，對粵採取妥協作法，派張繼、蔡元培南下廣東疏通，雙方約定粵方推汪兆銘、孫科、伍朝樞、李文範為代表，南京方面，由李石曾、張靜江、張繼、蔡元培、陳銘樞、吳鐵城為代表，於廿年十月廿五日，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樞宅，先後舉行七次會議，至十一月七日結束。公開約定，已見文獻，其秘密條款，則粵方要求京滬兩地及京滬路沿線，由粵軍負責警備治安工作。粵方希望以張發奎的老四軍擔任，中央方面原則接受，幾經商榷，改以原亦為老四軍的十九路軍擔任。會議結束之四日後，陳銘樞即發表為京滬衛戍司令長官，十九路軍趕調駐滬，十一月廿一日即行就職視事。十二月十五日蔣主席辭主席、行政院長，海陸空軍總司令本兼各職，國府主席由林森繼任，陳銘樞則以副院長代理行政院長。繼則以孫科、汪兆銘接任，陳

銘樞仍以副院長兼交通部長，均為粵人，屢次與蔣委員長電促胡漢民入京，共商國是，胡漢民總以體弱多病為由，以至於逝世，均未入京。成見之深，固為事實，溝通、聯絡工作乏人，當為主要原因。

陳銘樞以往昔對湖南及中原會戰之對張發奎、馮玉祥、閻錫山作戰以及剿共的表現，對安內工作如此之有貢獻，今中央在軍事、政治上昇于如此大任，則竟由安內執行人，一變竟轉為不顧「安內」，大嚷一致「攘外」，且由攘外竟而又向左轉，與共黨聯合，叛離中央。此中我政府在任用期間，我領導人縱有正確高明決策，而無人負責作政策意見溝通，以致任令共黨統戰發展，致其思想觀念日益偏差，此為一主要原因。陳在上海曾辦一神州出版社，所出刊物，言論已明顯與政府政策相左，此出版社之負責內部人員，均為日後福建人民政府要員，可能在這一期間，共產黨女黨員趁機與之接近，而後為陳之如夫人，陳之思想乃為之急劇轉變。

王亞樵與胡漢民、李濟、白崇禧、李宗仁均無直接關係，與此數人之交往，當主要為陳銘樞之拉攏。王亞樵本身亦為極端主張抗日，反對先行安內，故而對以上人員的拉攏，內心亦頗為所動。

搜括聚斂民脂民膏

陳調元在為孫傳芳部下時，駐防長江沿岸，皖南、皖中一帶，對國民黨同志，尤其是卅三軍的舊部，在響應北伐活動中，為陳逮捕槍殺不計

其數，促成安徽國民黨先進嚴重反感。兩度主皖中又繼續迫害黨中同志。陳調元長袖善舞，以在安徽斂聚的民脂民膏，供其左右逢源的揮霍，其在南京之公館，凡為國府要員，不為其座中常客的甚少，唯安徽國民黨的先進，則屬例外。旅滬安徽人士，對陳調元情緒上的反感，達於極點，如王亞樵在柏文蔚等的授意下，執行殺害陳調元之建設廳長張秋白，便是一例，足見王亞樵對陳調元嫉恨已甚。而陳調元以陣前起義，蔣委員長對其始則運用，繼則以石友三奉命集中浦口，約定委員長前往訓話，以便開赴廣東之際，陳在浦口，石友三、方振武等宴會後打牌，陳在石友三後面看牌，見石友三心情失常，已起疑竇。稍時石之副官前來，石又神情緊張，於密室中屏人密語。陳調元為軍閥，已猜透石友三三之心事，乃連夜渡江趕去委員長官邸，立候晉謁委員長，侍衛以無時間拒之亦不克，堅以有要情上報為辭。蔣委員長接見，乃謂明日浦口對石部講話，千萬慎重，最好派代表為之。在石獲知委員長不親往訓話後，以事機洩漏，甚為驚慌，適有一軍艦開至浦口，石友三乃以為是派去對其鎮壓行動者，倉皇率所部向滁州方向遁逃，石友三擬乘機劫持委員長之陰謀，於焉暴露。陳調元從此為委員長信任不衰，以至於死。旅滬皖人以恨陳調元，因而亦對於委員長有所不滿，此為王亞樵接受此一任務的先在原因。

新仇舊恨找次目標

為什麼要「刺汪」呢？這個問題與王亞樵毫不相干，主要是在拿了每月兩萬現大洋的經費，

經過一年的時間，仍沒有表現，幕後集團頗有煩言，且第一目標行動曾一度燭確，為求萬全，才要求指示一個第二目標。這個第二目標，本來也只是一個預備目標。當時提出來的一個現實而又具體的理由是：汪精衛在上海和平會議以後，參加政府，出任行政院長，本來是經過他們協商以後決定的，等於是代表他們那個集團參加政府。但是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以後，蔣委員長專心主持軍事，汪精衛在政治上幾乎和蕭何一樣的安定後方，餽送補給。他們認為對於蔣委員長的「安內攘外」政策，幫助很大，合作的非常徹底。當日在協商中對粵桂所立下的諾言，統統都沒有履行，他們認為汪精衛是出賣他們，所以把汪作為第二目標。前面所講的是新仇，另外還有很多的舊恨呢？「容共」期間，汪精衛在私人的往來上，和共產黨以及鮑羅廷走得最接近，甚至於廖仲愷雖然言論左傾，主張容共，但是他還有原則和分寸，並不是真正的一面倒向共產黨，放棄自己國民黨的立場。但是汪則不然，他雖然在言論上沒有像廖對「容共」「左傾」那樣的積極，可是實質上為了他自己的利益和名位，他是什麼也不顧忌的。所以「刺廖」案一發生，胡漢民因反對廖的言論積極，與廖針鋒相對，但那是原則立場上的問題。儘管胡的關係人也承認要殺廖，但廖不是胡殺的，胡自己心裏明白。所以在案發後，以胡和汪的莫逆關係，雖然胡出走的前夕，是躲在汪家裏的，但胡總有汪對他並未盡到作朋友的照顧和化解的責任，適時的仗義執言更談不到了。而胡漢民更懷疑廖仲愷的被刺，是共產黨「借刀殺人」，

「嫁禍」於他，汪精衛可能知情，甚至預謀。汪精衛趕走胡漢民，在黨裏汪便可以大權獨攬了。

好話說盡壞事做絕

胡漢民認為汪精衛的名位心最重，每一次在反對蔣委員長的計劃湊合上，他表現的最積極。可是這一次他對於蔣委員長所提出的「安內攘外」工作，所付出的助力，功勞也最大；可以說合作的非常徹底。因此，他們想到在「寧漢」分裂中，汪所扮演的角色，在清末民初中他和袁克定結為「金蘭」之交，與袁世凱合作，迫清廷遜位，又建議要國父辭職，讓位給袁世凱，以成就袁的野心。後來在袁稱帝中，大家都反袁，只有他一言不發，躲在外國。袁對國民黨中要人，個個通緝，個個亡命，只有汪精衛不通緝，可能還有經費的資助呢！國父北上和段祺瑞談判，他是積極主張的，因為段是袁的三大幹部之一，當然和汪的關係不同。國父去北平，他也跟了過去，結果段的真實態度，大謬不然。胡認為當日成就袁世凱，獨享革命成果，要國父讓位的導演是汪精衛，把國父騙去北平，氣死國父的導演人也是汪。汪對國民黨、對朋友，真是太自私了，真也可說是好人作盡，好話說盡，而壞事却作絕了。因此把他列為第二個目標，此中奧情，也確非簡單的呢！

箭頭指向當道首要

「刺汪」的經費，開始於民國廿二年，每月銀元兩萬元。只是經常費，沒有獎金的規定。因為主要是以政治教育為主，認為這是救國家、救

民族的一個捷徑。開始是由劉蘆隱負責轉發。經過了一段期間，因為劉蘆隱太囉嗦，頗有反感，乃改由粵桂按月付給李濟探的經費內，月撥兩萬銀元交王亞樵，再由王負責存入上海銀行香港分行，以本行轉賬方式，存入許志遠在上海銀行的賬號，錢到即通知前往具領。劉蘆隱的幕後人爲胡漢民，劉且爲刺殺楊永泰一案的幕後主持人。汪兆銘與楊永泰同是對「安內攘外」工作，以政治配合軍事，貢獻甚大的人。說這個案子的政治箭頭，是發自「統戰」射向「安內攘外」，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

王亞樵幼年，因爲和鄰人小孩子打架，被人扔石頭在鼻子上打了一下，傷癒後鼻準尖頭便留有一個小小的殘缺豁子。他在上海看相，相者認爲那個地方破了相，言他在四十八歲必招橫禍，恐難活過四十八歲，他每以此爲戲言，果然在梧州被刺時，年齡整爲四十八歲。江湖人士的識語，果不幸而言中了，真令人莫測其中的奧妙啊！

在港遙控徒子徒孫

華克之，江蘇揚州人，原爲南京金陵大學肄業學生。民國十六年清黨期間，在南京被捕，原已判決槍斃，是時王亞樵受命主持津浦路清除共產黨工作。王亞樵在上海期間，與韓恢將軍所領導之蘇北籍工人常有往來，韓去世後，此批工人乃由王亞樵領導，華之家人由此關係，輾轉託王營救。北伐軍總政治部主任吳稚暉，副主任陳銘樞，與王亞樵均有相當親密關係，乃以准予自首、改過自新名義，予以保釋。華克之感王亞樵救

命之恩，乃拜在王亞樵之門下爲學生。華克之雖身材肥胖，但爲人機警，乃在王亞樵之左右擔任行動工作，故王亞樵之行動工作，計劃執行，大多由華克之指揮。東南通訊社成立，王亞樵在香港遙控，京滬業務，完全由華克之指揮。

刺汪主角原形畢露

「刺汪」案後，華克之去香港，仍在王亞樵之手下工作。王去世後，抗戰不久即開始，華隨往來於港滬間。據事後得悉，華在南京被捕，爲王亞樵保釋自首後，根本未與共黨脫離關係，反藉王之關係掩護，秘密爲共黨工作。王去世後，華即在香、港，在共黨當時駐港之統戰負責人潘漢年領導下工作。民國卅八年大陸棄守，許志遠由滬潛抵香港，與華邂逅於半島酒店，華詢以「人民政府」剛剛成立，正需人効命之際，何竟離開？許答以他們要算舊賬。許在抗戰期中，在蘇皖邊區任游擊司令、縣長指揮官等職，與劉少奇、張愛萍多次鏖戰，事敗被俘，由中央向駐滬之周恩來、葉劍英交涉，電令釋放。臨行劉少奇、張愛萍、鄧子恢力勸與共黨合作，張雲逸、饒漱石且從遠道趕來，仍續勸打消行意，許終堅決返回中央。戰後又任泗縣縣長，綏靖清鄉，恩怨猶多，故不得不避來此間。華答謂：「小潘找我有急事，即要去滬，返來再爲詳談。」小潘者，潘漢年也。潘有兄弟多人，均爲共黨高級幹部，潘最小，故彼等均以「小潘」呼之，是時已隨陳毅去滬，出長上海市長及華東區共黨黨務工作矣。

華克之在大陸淪陷後，一直擔任中共之統戰

工作，往來於大陸香港間，地位頗高，正式名義不詳。據由美轉來消息華克之在大陸中共報紙中，亦曾以「刺汪」爲題，發表專文報導表述其爲共黨効力經過。是華克之以王亞樵爲掩護，運用王之關係，取得經費，以爲共產黨從事刺殺蔣委員長以及刺汪等工作，這不是很明白了嗎？王亞樵地下有知，真不知將作何感想了。

紅色如夫人出毒計

在王亞樵幕後，供給經費，指揮推動的集團裏，有兩位如夫人，對本案的推動，可能是發生很大力量的。一位是陳銘樞的如夫人，此人來路不明；自在上海入幕陳銘樞後，陳之思想，即急劇轉變。王亞樵與胡漢民、李濟、李宗仁、白崇禧間之橋樑爲陳銘樞，故此如夫人關係甚大。另一位則爲李宗仁之如夫人郭德潔，李之反對中央，多由郭之影響。李在大陸淪陷，棄政府於不顧，隻身去美，亦爲郭德潔之主張。最後李宗仁應邀返回大陸，投向毛幫，鬱悶而死，亦爲郭德潔所勸誘。聞郭德潔於李去世後，始表明與李婚前，即爲共黨分子，如此在此一案的推動上，以所關之重大，不遺餘力之推波助瀾，自亦必爲黨中的事了，惟此亦僅爲可能的推想而已。

(全文完)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破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二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